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主编助理:何超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两历奇迹,一生求索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我有幸在 2008 年 6 月出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经历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 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 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时的中国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等到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的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发展中国家

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基本上这些国家领导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中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了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 1982 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 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 年满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来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上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不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罪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 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



的继续存在而会伴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为了这些产业仍然被认为是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所必需的“先进产业”,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隐性”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分配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高,代价会比之前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比双轨、渐进的改革严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存在,总的来讲,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则更加严重。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渐进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存在,总的来讲,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则更加严重。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渐进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存在,总的来讲,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则更加严重。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锁,取得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须有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出现停滞和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我从 1987 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

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20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 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 D.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 15 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 199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

2005 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森夫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以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 1946 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 61 位主讲者,也是第二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 60 位主讲者中有 15 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 1968 年才开始颁发,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的应该超过 15 位。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共共有 5 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信,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

按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只要发展中国的政府能够务实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施政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以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该国的要素禀赋,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创造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来,都有可能告别过去的命运,开启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和脱贫的一章。

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主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诺奖得主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 年 6 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从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 300 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 1000 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去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及政府领导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经过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增加了我对过去 20 多年来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践上的价值,因此,利用 2009 年 6 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时的一个内部讨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侧重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侧重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 年 3 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经济学界的同行在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时要重回亚当·斯密,但是不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所揭示的对所关心的问题、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来。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是如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在十八世纪之前就是西欧那些发达国家也要 1400 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快速的发展是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这种快速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使得劳动的产出和价值不断增加,伴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资本需求和风险的扩大,各种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与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

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把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认为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的产业(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或要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政府的作用则是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在我提出“有为政府”的观点时,其他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政府的干预是正确的?就此,我发表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一文给予回应(更多可参新结构经济学讨论专题见 FT 中文网)。

2012 年 6 月世行任期结束前我将先前所写的相关论文结集,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离开世界银行以后,我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结合我在世界银行走访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崛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被人戏谑为“令人抑郁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因为从主流的经济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处处是不足和缺点。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则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即把微观企业和个人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以中国为例,1979 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中国的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中国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把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好来坐等各种新的产业在市场的竞争中自发的涌现。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各项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区和园区内,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中国在转型初期虽然劳动力的成本很低,但是中国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以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克服这个瓶颈限制,中国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地招商引资,鼓励国外具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国际买家信心的外资企业到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来投资设厂。

采取这种务实的办法,中国迅速发展起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

上述务实的理念和做法虽然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糟糕的选择,但是却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甚至是非洲的小岛国毛里求斯发展成功的秘方。

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证明了这种务实的发展思路和做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为了验证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适用性,2011 年我在世界银行委托了一项名为《非洲轻工业》的研究项目。该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只有中国同行业工资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业的一半。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为中国的 70%,与越南大体相当。劳动成本大约占中国制鞋业总成本的 1/4,因此埃塞俄比亚在制鞋业上很有竞争力。但是,2010 年,中国的制鞋业雇佣了 1900 万工人,越南有 120 万,而埃塞俄比亚只有区区 8000 人。

(下转 04 版)